

# 城魅

北京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人文路径

秦红岭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 城魅

北京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人文路径

秦红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城魅：北京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人文路径 / 秦红岭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09-9950-0

I. ①城… II. ①秦… III. ①城市文化-文化事业-建设-研究-北京市 IV. ①G12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41900 号

城魅：北京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人文路径

秦红岭 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地 址：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邮编：430074）

出 版 人：阮海洪

责任编辑：张淑梅

责任监印：秦 英

责任校对：王立坤

封面设计：赵 娜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996 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45 千字

版 次：2014年5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投稿邮箱：zhangsm@hustp.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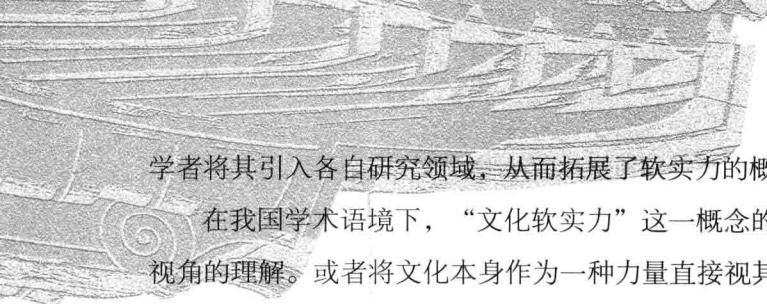
许多年前，著名作家林语堂曾说过：“几乎所有到过北京的人都会渐渐喜欢上它。它的难以抵御的魅力恰如其难以理解和描绘的奥秘。”<sup>1</sup>的确，对于既饱经历史沧桑，有着辉煌厚重的历史韵味，又日新月异、呈现勃勃生机的现代大都市北京而言，追寻她的文化魅力之源，难乎其难。这本书虽取名《城魅》，但仅仅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城市规划的人文角度，思考大城北京走向世界城市的进程中如何保持并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毕竟，世界都市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人文底蕴，源于其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何谓软实力？何谓文化软实力？何谓城市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提出。他认为，与国家的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等有形的“硬实力”(Hard Power)不同，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一种通过文化或思想的吸引力，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达到目的的能力。同时，约瑟夫·奈还提出了软实力的三个来源：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sup>2</sup>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主要是从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与国家实力层面上使用的。然而，该概念提出后，逐渐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

1 林语堂：《大城北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2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学者将其引入各自研究领域，从而拓展了软实力的概念外延与应用范围。

在我国学术语境下，“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内涵一向众说纷纭，有着不同视角的理解。或者将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力量直接视其为软实力的一部分，或者强调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国力，或者将文化软实力简单等同于文化竞争力、文化创新力，或者将文化软实力诠释为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复合作用力。我倾向于认同霍桂桓的观点，他认为“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所谓‘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由于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质（ethos）及其发展态势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受众产生的精神魅力。”<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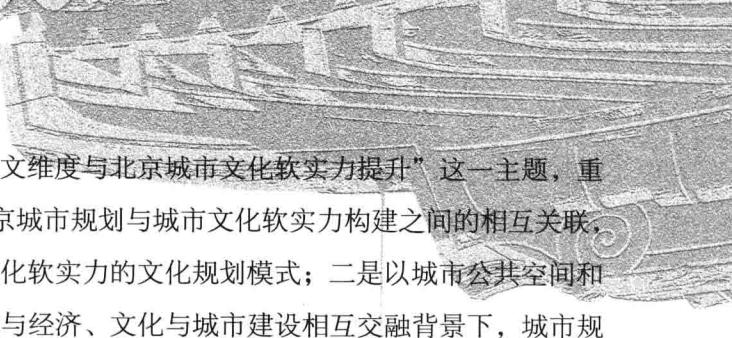
作为展现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文化软实力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区域及城市文化软实力两个层面。前者是从国家战略层面理解文化软实力，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使用“国家文化软实力”概念，便体现为一种中国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文化强国战略，强调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本书针对的是城市层面的文化软实力。

城市文化软实力在软实力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个城市建立起独特优势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涵盖了“城市文化”和“软实力”两个概念的内容，是以城市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表现在城市精神、城市形象、物质性文化载体和市民行为等多个层面，主要体现为城市延续和形成有吸引力的文化特色的能力、创新和制造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的能力、营造有凝聚力的文化氛围的能力和塑造有魅力的城市形象的能力。

从城市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趋势来看，不能仅停留于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笼统的方法和途径，应凸显问题意识，注重分析制约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并从不同视角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同时，还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城市在塑造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具体经验与有效方法，推动我国城市文化软实力研究走向深入。

---

<sup>3</sup> 霍桂桓：《文化软实力的哲学反思》，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



本书将围绕“城市规划的人文维度与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这一主题，重点探讨两方面问题，一是思考北京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是探讨基于提升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规划模式；二是以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为重点，着力研究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城市建设相互交融背景下，城市规划如何提高人文含量，如何充分发挥北京城市规划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只有具有独特的城市个性，才会拥有迷人的城市魅力。以独有的城市格局和建筑形式所呈现出的古都历史文化风貌与丰富璀璨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北京最珍贵的人文资本，在世界城市范围内比较，也具有非凡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文化软实力是北京的优势资源要素。历史上的北京城，以其匀称明朗、气象非凡的城市格局而成为世界城市史上的典范。今天的北京，伴随日新月异的城市快速发展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催化作用，一些媒体将其看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城市重建”。然而，随之而来的城市文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城市文脉不断淡化，历史遗存支离破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空间如风卷残云般消失，城市形态走向“千城一面”般趋同。

一个城市，若能够保持自身特色并具有持续活力，便是不可替代的。相反，丧失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便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虽然偌大的北京所保留的历史风貌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但巍峨的紫禁城还大气磅礴地傲然挺立，北京城市的骨架还在，尤其是作为核心特质的中轴线布局仍延续至今，一些最具识别性的城市文化符号要素还可以有机串连起来，它们在北京城市特色、城市意象和城市文化气质的建构中，仍起着支撑作用。因此，对于正处于从国际城市迈向世界城市战略转型期的北京，如何扎根过去，并不断创新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与优秀建筑文化，反思并调整以往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使北京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文化上表现出鲜明的京味元素、独特的人文魅力和高尚的文化品位，将是塑造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正因为如此，本书“古都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章，主要以元大都和

明清北京城为线索，从珍惜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与人文环境的立场出发，梳理被建筑大师梁思成誉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北京城在城市建设方面鲜明的人文特色及魅力之源，从而为当代北京在城市特色塑造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既奠定厚实的基础，又提供可资借鉴的丰富文化资源。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有魂的文化。“躯壳易铸，魂难求”，有魂的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岁月的磨砺和历史的积淀。正是那既体现帝都之辉煌雄壮，又体现“盛民之城”之宽厚平和的京味文化气质，那萦绕着绝世回响的历史文化遗产，恰是我们不能丢掉的北京文化之魂。

“特色之都：文化规划与北京城市形象塑造”一章，讨论了作为城市规划子系统文化规划在北京城市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城市文化与空间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从价值评估、空间策略和效力评估三个层面探讨了如何有效引导两者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并建立了基于提升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规划支撑框架。本章的亮点是结合北京的发展状况，以公共文化资源要素适宜性定量评价为基础，在尽量不遗漏重要评价指标的前提下，选取与城市规划紧密联系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效能和城市文化影响力等5项综合评估层、15项评估项目层和50项具体的评估因子，初步建构起基于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文化规划指标体系。本章还在借鉴欧美城市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形象重塑的关键途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的一些规划路径。

“文化风景：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建构”一章，探讨了城市公共空间在塑造和展示北京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几乎所有伟大的城市，都有充满魅力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城市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物质性的实体空间，既是居民进行公共交往活动并体会城市风情的开放性场所，也是城市形象、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本书主要讨论如何在人文关怀、个性化、多样化，尤其是公共艺术的成功介入等方面，提升北京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建设的文化价值，这对促进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积极作用。走向世界文化之都的北京，应当把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营造，作为以空间方式介入城市文化问题的一种积极途径，让充满人文魅力与艺术感染力的公共空间成为北京城市形象的靓丽名片。

“文化强市：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一章，实际上是上一章的进一步深入与扩展，因为从广义上说，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形式，其基本含义是指具有文化意义或文化特征的公共空间，即凡是能够为市民所平等享用、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场所，都属于公共文化空间的范畴。本书讨论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指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设施和文化艺术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公共艺术区等，它们是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底蕴和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标尺。对比世界上一些文化先进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北京的文化空间层级呈现顶层文化旗舰项目国际影响力不足、底层以公共图书馆为核心的社区文化空间服务能力低、市民认同度和参与度低的问题。因此，如何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与服务效能、提升北京公共文化空间的国际影响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对于世界文化大都市而言，以艺术区为代表的文化聚集区能够吸纳多种文化资源、丰富城市文化形态、彰显城市文化魅力。21世纪之初，798艺术区便成功跻身北京文化新地标。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最负盛名和最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区。对于798以及北京其他艺术区的未来发展之路来说，如何平衡文化生态与商业繁荣的关系，将是其能否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关键。

“走向宜居：北京城市形态的人文定位”一章，讨论的是城市形态问题，即由城市的物质实体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所呈现的城市整体“相貌”。城市形态不仅是指城市各组成部分的有形表现，也不只是城市用地在空间上呈现的几何形状，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往往体现为一种文化与历史形态，并或隐或显地表达着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本书关注的不是城市空间上的物理形态，而是作为城市文化与意义载体的形态。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现代城市，在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魔杖让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物质生活日益丰裕时；在技术理性主导下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让城市的物质形态越来越“秩序井然”，城市却越来越像一架冰冷复杂的物质容器，高楼林立的外壳下包裹着一个“失魂落魄”的城市机体时；尤其是当北京常常被混浊灰黄的雾霾笼罩，清澈明朗的湛蓝天空成为稀缺资源时，这种种现象，难道不让人们认真反思吗？城市若不能宜居，所有长处都不足道矣！对北京城市形态人文定位的思考，旨在通过探讨富有魅力的

世界级城市形态的价值标准，在人文层面反思北京城市形态的主要问题，提出宜居、和谐与人性化的人文价值目标，以此提升北京城市形态的文化吸引力。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共性越来越多，但地方特性却越来越重要。城市文化软实力说到底，不过是城市特有的文化个性，是城市不可替代的文化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成败。作为瞄准跻身世界城市的中国首善之都，北京“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城市性质与定位，就注定它未来的发展之路，必将要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浓墨重彩！



## 引言

### 目 录

#### **古都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 一、礼制秩序“理想国” / 2
- 二、壮美秩序“魅力线” / 8
- 三、古都风貌“文化魂” / 25

#### **特色之都：文化规划与北京城市形象塑造**

- 一、文化规划的界定 / 47
- 二、基于提升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规划模式 / 55
- 三、基于文化规划的北京城市形象塑造 / 69

#### **文化风景：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建构**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价值 / 82
- 二、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建构 / 100
- 三、公共空间文化营造与公共艺术成功介入 / 116

#### **文化强市：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

- 一、北京城区公共文化空间现状调查 / 130
- 二、提升北京公共文化空间软实力的对策 / 141
- 三、从艺术区的发育看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 / 161

## **走向宜居：北京城市形态的人文定位**

- 一、好的城市形态的价值标准 / 176
- 二、北京城市形态问题的人文反思 / 186
- 三、宜居、和谐与人性化：北京城市形态的人文定位 / 194

## **参考文献 / 224**

## **致谢 / 233**



# 古都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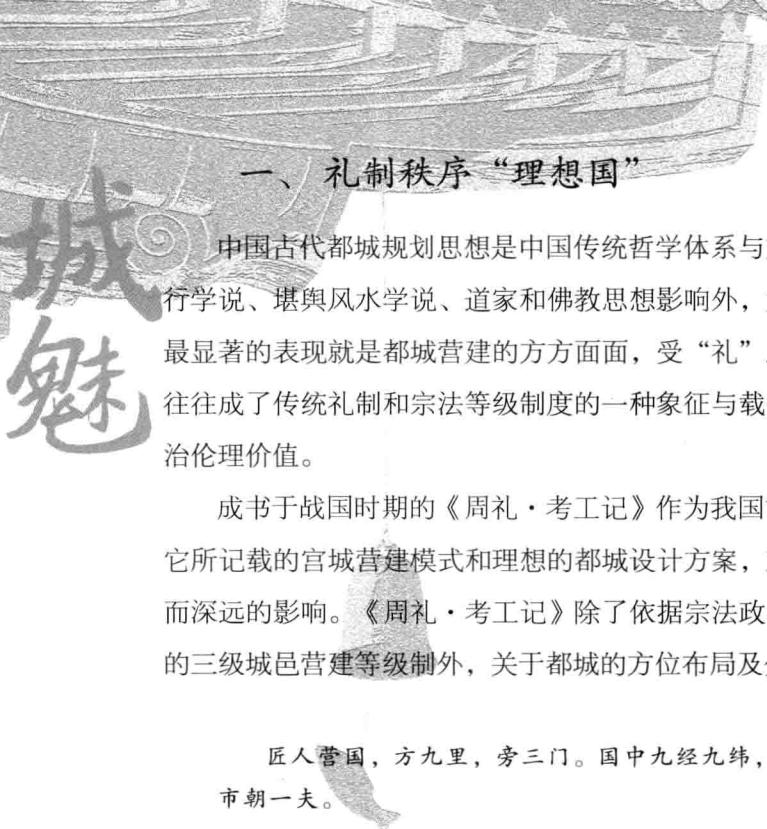
卫民建邦，上肇神禹；气凝后土，法范紫宫。拓卢龙燕蔚之区，聚梯航担登之众，人文渊蔚，财物阜充，辽、元据为兴都，明、清于兹奠宅。郁葱万堵，回环九闕，沿革异形，基疆变古，五朝王会，高控中枢，四达康衢，屹为重镇。论政识冲繁之故，占风验扃鐍之雄。

——原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旧都文物略》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渊蔚的文化名城，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八百余年的建都史，相继成为燕（诸侯国）都城、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和清的帝都。作为文化古都，北京不仅留下了众多体现中华文明成果的文物古迹，而且，作为先有规划而后建都的伟大都城，它在城市格局和古都风貌上也为后世留下了充满文化魅力的宝贵遗产。可以说，以独有的城市格局和建筑形式所呈现出的古都历史文化风貌是北京最珍贵的人文资本。

下面将以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sup>1</sup>为线索，梳理被建筑大师梁思成誉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北京城在城市规划方面鲜明的人文特色及其魅力之源，从而为当代北京在城市本土化特色塑造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

<sup>1</sup> 清朝建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朝北京城，虽有局部革新，但整体布局未做改动。正如梁思成所说：“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74页。）



## 一、礼制秩序“理想国”

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与文化传统的产物。除了受阴阳五行学说、堪舆风水学说、道家和佛教思想影响外，尤其深受儒家宗法伦理的影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都城营建的方方面面，受“礼”之制约与影响，建筑和都城布局往往成了传统礼制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种象征与载体，体现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伦理价值。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传世的重要城市建设文献，它所记载的宫城营建模式和理想的都城设计方案，对中国古代都城营建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周礼·考工记》除了依据宗法政治的需要，实行依爵位尊卑而定的三级城邑营建等级制外，关于都城的方位布局及分区规划有一段著名的话：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

这里所谓“国”，意指“城”，“营国”就是营建城邑，即规划师丈量土地和规划都城时，都城规模是九里见方，每边开有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街道宽可容九辆马车并行。宫城居于正中心，左右对称布置宗庙（居东）和社稷坛（居西），朝廷在前（即南部），商市居后（即北部），朝和市的面积各为一百亩（图1-1）。显然，这是一个空间秩序十分严整的格局，天子所居之地的宫城必居中心，以此为平面坐标设立其他建筑群，城邑用地被经纬涂正交干道及次一级的街巷组成的方格网，规整地划分为若干街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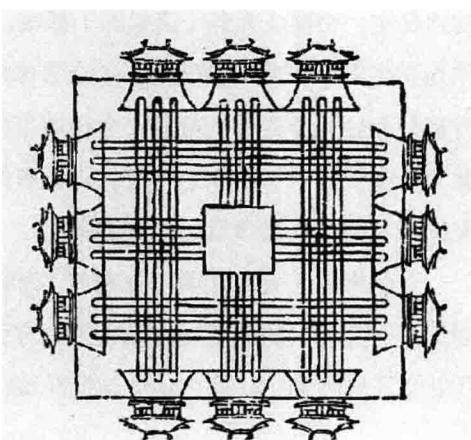


图 1-1 宋·聂崇义《三礼图》中描绘的王城规划

台湾学者赵冈认为：“周代的城不是由自然村演化而来，而是为了特殊政治

使命而建造的，所以有明显的规划性。从选择地点到城内建筑物布局都有一套理论与原则，加以诸侯各国互相观摩仿效，久而久之便形成一套标准模式。”<sup>2</sup>《周礼·考工记》所描绘的王城规划格局，便是统治者对城市设计所制定的一套理想的标准模式。应当指出，城市毕竟不是模式化的产物，几千年来古代都城的规划布局，难以绝对按照《考工记》之形制建造，而且至今考古仍未发现古代都城完全符合“匠人营国”制度的古城遗址。然而，《考工记》中强调的礼制精神和包含的儒家文化思想却基本不变，并成为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理念。

在我国古代都城之中，对《考工记》的规划思想体现得最为彻底的当属元大都城（图1-2）。对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

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出现之后，无论是秦的咸阳，还是汉唐的长安与洛阳，在其平面布局上，也都不见《考工记》理想设计的踪影。只是到了元朝营建大都城的时候，这才第一次把这一理想设计，付诸实现，但也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结合这里的地理特点，又加以创造性地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幅崭新的设计图案。”<sup>3</sup>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将统治中心南移到燕京，并将燕京改名“中都”，作为陪都。1266年，忽必烈诏命张柔、段天祐同掌工部事，并派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于中都之北三里，筑城围六十里。九年，改为大都”<sup>4</sup>，即1272年忽必烈将中都

<sup>2</sup>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sup>3</sup> 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15页。

<sup>4</sup>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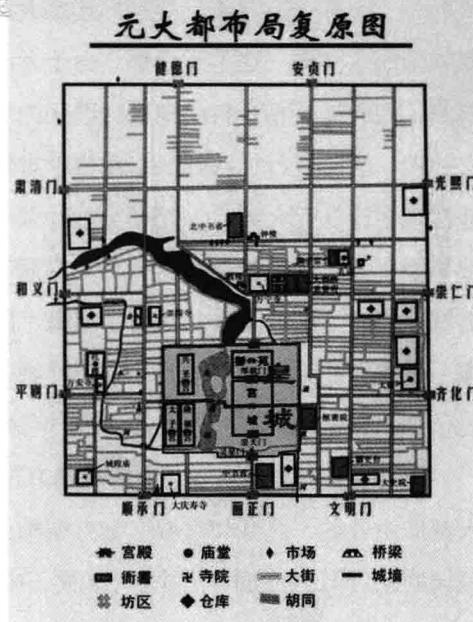


图1-2 元大都城布局复原示意图

# 城魅

改名为“大都”，并从上都开平迁都大都。经过 20 余年建设，于 1287 年在原金中都城址的东北侧兴建了元大都。由于大都城是另选新址营建，没有原金中都旧城的限制，因而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理想的规划。元大都的规划设计者刘秉忠除了对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八卦风水和佛学有较深造诣外，受儒学礼制之说影响也很大。他在规划设计元大都时，兼顾礼制要求与地理环境和实际需要，一方面恪守《考工记》中有关王城的规制模式，另一方面考虑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水源问题，确定宫城位置在太液池（今北海与中南海）以东地方，并巧妙利用了太宁宫所在的积水潭一带水域的地理特点。此外，大都城还体现了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与蒙古人的多元信仰，突出表现在一些宗教建筑与宫殿的室内布置风格方面。<sup>5</sup>

大都城布局整齐优美，轮廓严谨方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伟大城市。大都城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套方城构成，方六十里。外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城墙的东、南、西三面开三个门，北面正中的一座城门不设，故元大都共有 11 座城门，外城的四角还设有角楼，环城挖有护城河。皇城在外城内的南部中央区域，有萧墙环绕，周长约 20 里。宫城则位于皇城内偏东区域，其中心位于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上，从而突出了宫城的重要地位。而且，大都城的规划者还沿宫城中心线向北延伸至积水潭东北岸，实测确定了大都城平面布局的中心点（今鼓楼一带），名为“中心之台”，作为整个城市的几何中心。大都城内主要建筑群的布局合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基本原则，即宫城在城内南部中央，商业区在宫城正北，祭祖的宗庙，即太庙在宫城之东（齐化门内，今朝阳门内），祭天地的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平则门内，今阜城门内）。大都城的街巷由于是按设计方案规划，因而井然有序。城内连同顺

5 例如，王岗指出：“如果说，在城市规划方面元朝统治者遵循着传统的农耕文化的原则，那么，在具体的建筑物的兴建方面，却更多地体现出‘百花齐放’的精神。这从当时的一些主体建筑当中，得到反映。据文献记载，在当时的皇宫里面，宫殿内的布置风格完全是游牧文化的体现——地上铺着厚厚的毛毡，墙上挂着各种名贵的兽皮。而在宫殿外面，也种满了茂草，环境十分宜人。”（王岗：《北京古都风貌的延续性》，北京文物局官网），在重要建筑方面，作为元大都标志性建筑的白塔寺，则体现了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对喇嘛教的信仰。建造这座白塔的工匠是尼泊尔人阿尼哥，他依据藏传佛教所沿袭的样式，修建了白塔，因而该塔又被人们叫做“喇嘛塔”。

成街在内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 9 条，与《考工记》九条之数相符，并且全城的街道宽窄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还有许多排列整齐宽六步的胡同，南北与东西街道相交形成一个个棋盘格式的居民区。难怪据说在大都城住了 17 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元大都城：

整个城区按四方形布局，如同一块棋盘。设计的精巧与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sup>6</sup>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 年）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同年，明大将徐达攻入元大都城，随后改大都城为北平府。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元代宫室一毁于明徐达改筑都城之初，再毁于永乐迁都之岁。”<sup>7</sup> 明洪武三年（1370 年），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守北平府。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朱元璋病死。第二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推翻建文帝，自承皇位。永乐元年（1403 年）升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 年）朱棣下诏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 年）建成竣工。永乐十九年（1421 年）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

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北京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sup>8</sup> 由此可见，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考南京城的规制而营建的。李允鉉则认为：“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之间的继承关系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全新的改造，结果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城市规划的杰作。”<sup>9</sup> 不同于大都城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三套方城构成，明中期为加强北京城的防卫，尤其是对北方蒙古骑兵的防卫，于 1553 年起又修筑外城，将内城围合在里面，但 1563 年时因财力不支而终止，仅完成部分，只建了南半部，从而使整个北京城的轮廓呈“凸”字形，如今北京城二环路指的大致是明代这个“凸”字形大圈。总体上说，明北京城所遵循的规划宗旨同元大都一样，都是《考工记》，其布局进一步

6 [意大利]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戴树英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年，第 96 页。

7 [清]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429 页。

8 《明成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

9 李允鉉：《华夏意匠》，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87 页。

# 城魅

彰显了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伦理意识（图 1-3）。其中，皇城位于内城中央偏南，呈南北稍长的长方形，西南缺一角。皇城以内为禁地，百姓不得居住。作为皇帝理政和居住的地方，宫城从明万历年开始又称“紫禁城”，位于皇城之内。相比于元代，宫城的位置南移，使之能够居全城之中心。与元代不同的是，明代将太庙和社稷坛迁入皇城之中，设置在宫城之前，左右并列，显示族权和神权对皇权的拱卫，更加突出了尊祖敬宗、社稷为重的主题。

尤其要强调的是，礼制之影响还集中体现在紫禁城的布局和规制上，形成了所谓“前朝后寝”和“五门三朝”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通过巨大的平面延伸，通过众多单体建筑间的有序组合，刻意表现了一种等级严明的社会政治秩序。所谓“朝”，即为帝王上朝治政、举行大典之处；所谓“寝”，即帝王与后妃们生活居住的地方。由于宫内的主要政治活动场所是“朝”，因而宫城营建也主要围绕“朝”展开。为了烘托帝王的尊贵地位，“朝”需要通过极高的建筑规制和宏大的气势来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与江山永固。早在周代时，宫殿建筑群体布局便形成了所谓“五门三朝”之制：“三朝者，一曰外朝，用以决国之大政；二曰治朝，王及群工治事之地；三曰内朝，亦称路寝，图宗人嘉事之所也。五门之制，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又云毕门。”<sup>10</sup>明清紫禁城的布局便大体沿袭上述“前朝后寝”和“五门三朝”型制。由于前外朝是封建帝王颁发政令、举行朝仪之地，所以，在紫禁城中它几乎占到三分之二深度，自午门开始至乾清门止，占地面积达 85000 平方米，主要布置象征中心的大殿。前朝建筑的等级最高，气势最宏伟，装饰最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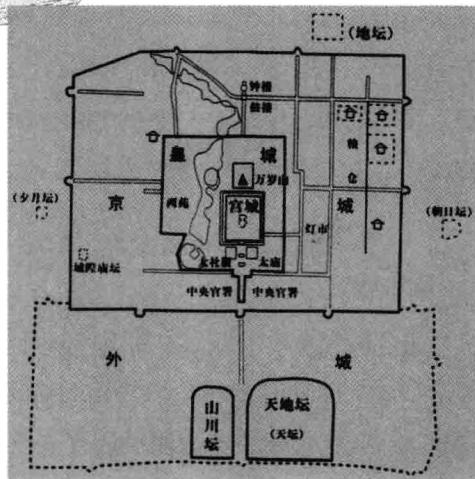


图 1-3 明代北京城布局示意图

<sup>10</sup> 刘敦桢：《刘敦桢文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年，第 456 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五门”的位置与名称各家说法不一。